



台灣文化協會的現代意義*

● 林柏維*

1. 狂飆的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

1920 年代，是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的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他們以文化運動的方式，拓展出爭取政治權益的全民運動，以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的方式，展開階級的、民族的運動；他們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1) 國際潮

相對於整個國際環境，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帝國主義的形成、社會主義浪潮的湧現、西方民主社會體制的抬頭、中國歷史朝代的更新，相輔而成國際潮，台灣則經由日本「母國」而介入。由於歸屬的相互關係，日本社會之於台灣自然成為媒介，受日式現代教育的知識菁英所選擇之運動方式即在此國際潮中前進。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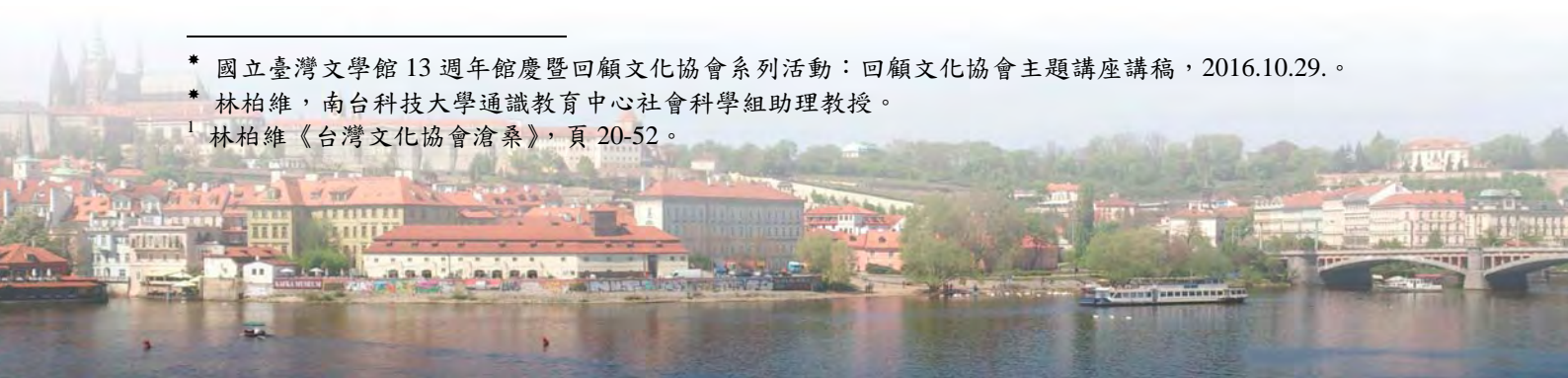
這國際潮包括了：民族自決的潮流、列寧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愛爾蘭獨立運



* 國立臺灣文學館 13 週年館慶暨回顧文化協會系列活動：回顧文化協會主題講座講稿，2016.10.29。

* 林柏維，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¹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0-52。



動模式的仿效、朝鮮三一事件的推波助瀾、大正民主的歷史時空。留日新青年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思慮台灣的前途，集結在蔡惠如、林獻堂的領導下組織啟發會、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先是擬議六三法撤廢運動，轉而進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2)台灣文化向上

相對應於留日新青年的積極作為，島內以台灣醫專、師範學校出身為主的菁英，推舉蔣渭水為領導，共謀出路，先是成立文化公司，繼而取得林獻堂的首肯，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會員1032人，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蔡培火），文化協會的組成代表著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的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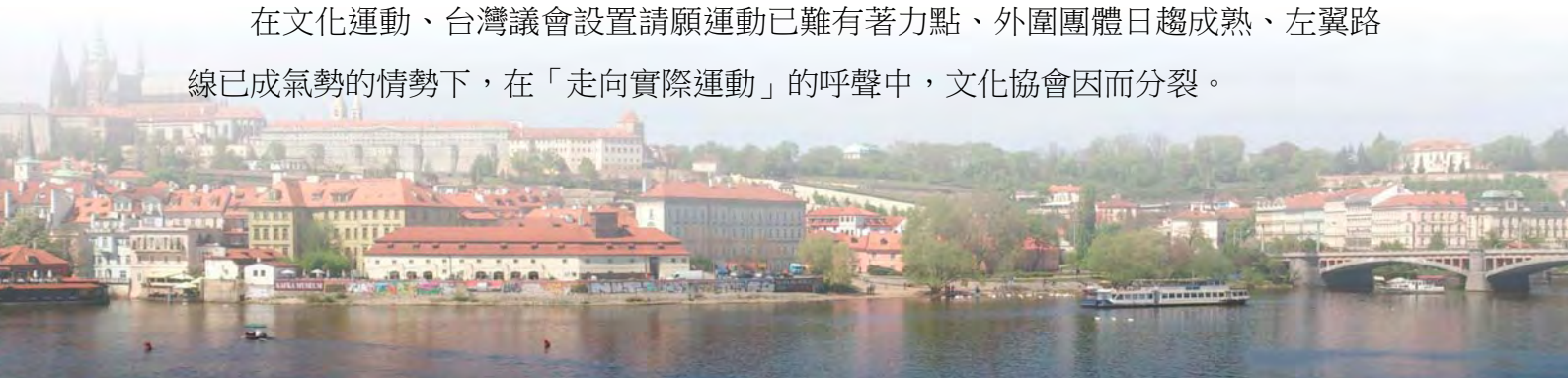
文化協會成立後，迅速發展它的組織，分立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等五個支部，並且支援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文化運動所形成的磅礴氣勢，使台灣總督府採取了壓制的措施，先是以公益會來反制，並以有力者大會來反擊，進而於1923年12月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全島大逮捕重要幹部，此即治警事件，文化協會受此衝擊反而更加蓬勃發展。

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進而爭取政治權，造成民族自決的氣勢，以期脫離日本統治，林獻堂說：「要以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就是這樣的意思。

(3)文化仔

啟蒙運動為主的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在訊息的傳遞上，他們發行會報、設讀報社；在教育的層級上，他們辦夏季學校、設立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在知識青年的結合上，他們協助青年團體的組成；在文化種子的傳布上，他們推動白話文的使用；在社會風氣的開通上，他們提倡新劇，組電影隊。在經濟面的抗爭上，他們成立本土資本的銀行；最重要的是，他們廣泛地、連續地舉辦各式的演講會，直接向民眾進行宣導、教育，從支部的文化講演、政談演說、農村講座到東京留學生巡回講演，掀起全島文化啟蒙的熱潮，使「文化仔」在1920年代成為「進步」、「改革」社會標籤。

在文化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已難有著力點、外圍團體日趨成熟、左翼路線已成氣勢的情勢下，在「走向實際運動」的呼聲中，文化協會因而分裂。



(4)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

左翼的連溫卿、王敏川掌控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右翼的蔡培火、蔣渭水另於 1927 年 7 月 10 日，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路線。²

轉換方向後的文化協會，以連溫卿為中心，本部設於台中市，展現與舊文協時代完全不同的風貌，「主張以最大多數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1928 年 4 月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決議：「利用文化協會作為共產黨活動的舞台」。1929 年 11 月，謝雪紅及台灣共產黨掌握了文化協會，1931 年日方大逮捕台共黨員，文化協會被迫解散。

台灣民眾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在蔣渭水的領導下也逐漸左傾，右派的林獻堂、蔡培火等脫離，於 1930 年 8 月，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由楊肇嘉主導。分裂後的台灣民眾黨，由於急進的政治主張，終於在 1931 年 2 月，被禁止結社。

1935 年，台灣舉行有史來第一次選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階段任務完成，在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自動解散，為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劃上休止符。

2.文化協會的歷史實驗

台灣文化協會在 1920 年代展開的社會運動，以文化運動為名，啟蒙運動為實的方式，拓展出爭取政治權益的全民運動，以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的方式，展開階級的、民族的運動。

(1)文化啟蒙：台灣民報為核心的文化運動

1920 年，新民會在東京創刊《台灣青年》，1922 年更名為《台灣》，同時發刊《台灣民報》，做為台灣人唯一之喉舌、文化協會的機關報，這三份刊物偏重於政治、社會的議題，也為文學運動預留了園圃。

²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23-251。



1921年10月17日，林獻堂、蔣渭水結合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組織台灣文化協會，主旨為「謀台灣文化之向上」。

文化協會支援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運動形成的磅礴氣勢，使台灣總督府採取壓制措施。1927年，新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1929年，台灣共產黨掌握文化協會，1930年當局大逮捕台共黨員，等同解散文化協會。

文化協會在啟蒙運動的目標設定上，表面上是提升文化，實則要強化台灣的特殊性，黃呈聰主張建設台灣的特種文化，避免被同化；蔣渭水主張消除民族差等待遇，提高台灣人的品格，完成「台灣人的使命」；蔡培火主張建立自尊的人格，用台灣話語喚起民族覺醒。

二〇年代台灣的知識菁英從這一個團體中尋找台灣的未來，以啟蒙為標的的諸般活動，在統治者允許的空間中孕育了更多社會的領導階層，他們活躍於那個時代，也活躍於戰後的歷史舞台。

(2) 議會政治：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920年，在蔡惠如、林獻堂的領導下組織啟發會、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先是擬議六三法撤廢運動，林獻堂聽取新民會幹部兩派主張後，「指示，照理當然要主張完全自治，但是政治改革需要實力，不能徒托理想，依我同胞目前之實力，只好要求設置台灣議會，為共同目標而奮鬥。」³1921年1月30日，林獻堂領銜，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等新民會會員共178人簽署，向第44屆日本帝國會議貴族院暨眾議院提出請願，結果是被議會決定「不採擇」（不予審議），這一失敗性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進行到1934年，前後14年，請願共計15次。

綜觀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過程，文化協會都是推動主力，分裂後則由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最終成果雖只是1936年半套式的州郡街庄議員選舉，卻也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寫下新頁。

(3) 群眾運動：文化講演

文化協會之所以能起波瀾壯闊的文化潮，講演會無疑起了主導的作用，影響最廣泛、最深遠。其講演活動可概分為：

³ 蔡培火，前引文，頁176。



其一、通俗講習會。包含：文化義塾啟蒙計劃（1922年）、3回短期講習會（連雅堂台灣通史講習會、蔡式毅通俗法律講習會、蔣渭水石煥長、林野之通俗衛生講習會，1923年）、通俗學術講座（1923年12月到1924年9月，44回）、長期講習會（連雅堂高等漢文講習會，1924年。林茂生西洋歷史講習會、陳逢源經濟學講習會，1923年）、通俗講演（1924年）。

其二、夏季學校。在台中霧峰林家花園（萊園）舉辦，共舉辦三回：第一回夏季學校（1924年）、第二回夏季學校（1925年）、第三回夏季學校（1926年）。

其三、文化講演會。起源於1923年7月，東京留學生組織文化講演團巡迴台灣各地講演。文化講演乃是文化協會任何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環，從城市走向農村，無限擴展文化啟蒙的效力。依其性質可分為：文化協會為主體的文化講演、東京留學生的巡迴講演、支持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講演（台南政談演說會、彰化政談演說會、斗六政談演說會、台南再開政談講演會）、各種青年團體的講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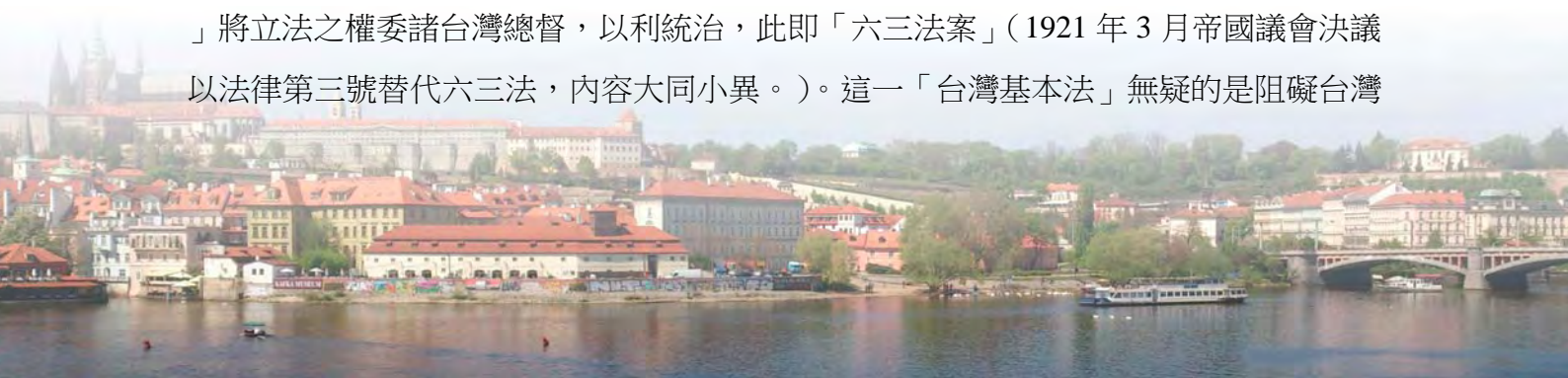
文化講演會深耕到台灣的每一角落，在人民心中烙下不磨滅的印記，戰後，黨國體制下的民主運動就深受影響，聽講演會也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3. 認同意識模糊與路線爭議

整個二〇年代社會運動的發展，如曇花一現般，反殖民體制的抗爭匯聚成洶湧的江河後，以煙消雲散收場，推究其原由，一般皆以1927年文化協會的大分裂為立論點，甚至將歷史責任推移到左翼路線的菁英份子上，強化了歷史的表面現象，忽略了認同意識模糊與社會運動路線爭議間的相互因果，亦即社會運動者在尋找自我歸屬的定位上強化了己身陣營的正當性，忽略了「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本土認同的經營，或可說徬徨於「台灣何處去」的無定見，方是分立的核心吧！

(1) 統合或者獨立？

1896年3月，台灣總督府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令之法律案」將立法之權委諸台灣總督，以利統治，此即「六三法案」（1921年3月帝國議會決議以法律第三號替代六三法，內容大同小異。）。這一「台灣基本法」無疑的是阻礙台灣



脫離日本的桎梏。林獻堂於 1920 年與蔡式穀、蔡培火、林呈祿等東京台灣留學生討論這一議題，同化論、非同化論、祖國論、大亞細亞主義論等各種主張議論紛紛，最後達成協議：在「同化非同化」的根本上，進行撤廢六三法運動；意即：先讓台灣人成為日本人，取得相同權利後再來爭取台灣的自治。於是而有蔡培火主張之「六三撤廢期成同盟」的成立。

那時，林呈祿持反對立場，認為應該在朝野都認為「台灣情形特殊」的基礎下，要求在台灣設立特別的代議機關，來行使特別立法。主張要求設立「台灣議會」。

兩派的終極目的地其實相同，然而步驟上，「撤廢六三法」是須先被統合到帝國裡，而「台灣議會」則是直接要求台灣自治。

台灣何去何從？這樣的命題不僅困惑著 1920 年代留日台灣青年，困擾著當今的我們：統合或者獨立？

(2) 議會路線與民主政治

1920 年，新民會先是擬議六三法撤廢運動，繼而決定以設置台灣議會為奮鬥。自 1921 年 1 月起到 1934 年，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前後 14 年的失敗性議會請願運動，共計請願 15 次。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明顯的是「愛爾蘭獨立運動模式」的仿效，企圖藉由議會參與來爭取台灣的自治。⁴然而不同的是，當時愛爾蘭已能選出議員參與國會，台灣卻無此條件，林獻堂等人甚至乾脆放棄國會參與，直接要求設立台灣議會，獨立自主的意圖昭然若揭，自然被統治者百般打壓。

放眼現代台灣，國民黨長期專政下，反對勢力要取得政權採取的正是文化協會時代所定調的議會路線，歷史的推移是：反對勢力進入國會發聲、組成反對黨、經由不斷挫敗的選舉取得政權，進而產生政黨輪替，樹立了民主政治。

(3)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進而爭取政治權，造成民族自決的氣勢，以期脫離日本統治；議會派從「帝國議會議席」轉戰至「地方自治議席」的路線時，「日台合作」也使民族運動的大纛搖向貼近現實的妥協路線。在議會運動路

⁴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8-29。



線遭遇挫敗下，「走向實際運動」的呼聲高漲，文化協會因而分裂。

從 1926 年的論爭中來觀察派系的分野，可以發覺派系分離派系的因子在於「走向實際運動」與否的政治觀點歧異上。從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模式被提出後，路線爭執即已存在，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影響，蔡培火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黃呈聰則強調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王敏川則偏向社會主義革命，林呈祿主張走溫和的、體制內的台灣議會運動。

從文化的認同意識切入，派系間的爭執點浮現出來的是：本土認知與「漢文化」、「和文化」間的糾葛，傳統與現代間的矛盾。堅守傳統似乎需與舊文學結盟，似乎需與使用漢文相連結，語文認同的歸趨是中國意識（祖國意識）的強烈表達，仕紳階層無須轉換就具備了這樣的條件。新青年祖國意識包袱輕，他們的現代感來自於現代日本與中國，在文字的驅策上他們選擇學習對岸的「白話文運動」；在政治活動上，他們學習、模仿中國國民革命、蘇聯共產主義、日本民本主義、社會主義。

社會運動領導階層所認同之「祖國」是「用來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抗的工具。在對抗異族殖民統治的過程當中，他們心目中的『祖國』是經過理想化的，與實際存在的祖國，有著相當大的差距。」⁵亦即無論傳統仕紳或新青年，他們所懷抱的「台灣意識」層級未能超脫「中國意識」，混淆了從事社會運動者的現實理想，因此在左右分流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看到民族運動者站立在橋中向兩頭的日本與中國拼命拔河。

附表：192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領導階層派系分流表

派別	思想傾向	社會運動路線	代表團體	代表人物	認同方向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化的啟蒙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 1921.10.17.	林獻堂、蔡惠如、 蔣渭水、蔡培火、 王敏川、林呈祿	台灣人的台灣 世界的台灣 日本的台灣 漢人的台灣
右派	民族主義派 【本土派】 【祖國派】 【日本派】	議會運動 合法的民族自決政 治運動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1930.8.17.	林獻堂、蔡培火、 楊肇嘉、蔡式毅、 洪元煌、葉榮鐘、 陳逢源、葉清耀	台灣人的台灣 漢人的台灣 日本的台灣
	全民主義派 【本土派】 【中國派】	全民運動 民族運動與階級運 動並行	台灣民眾黨 1927.7.10.	蔣渭水、謝春木、 黃周、李應章、 陳其昌、彭華英、 廖進平、黃旺成	台灣人的台灣 漢人的台灣

⁵ 李筱峰〈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6，頁 284。

左派	社會主義派 【本土派】 【社會派】	階級鬥爭 農民運動、工人運 動，結合農工小資 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新台灣文化協會 1927.1.3.	連溫卿、王敏川、 鄭明祿、吳石麟、 林碧梧、楊 貴、 林冬貴、張信義	台灣人的台灣 世界的台灣
	共產主義派 【中國派】 【共產派】	階級鬥爭 改造文化協會為大 眾黨	台灣共產黨 1928.4.15.	林木順、謝雪紅、 翁澤生、潘欽信、 蔡孝乾、洪朝宗 林日高、莊春火	共產國際的台灣

4.文化協會的歷史延伸

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進而爭取政治權，造成民族自決的氣勢，以期脫離日本統治，林獻堂說：「要以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文化協會在那個年代就是以改造的、創新的精神推動諸般活動，這些在歷史塵埃淹沒中的史跡，以這個時代來看多面向的啟蒙活動依然充滿了活力。

(1)改革意識：社會階層的覺醒

文化協會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意識成型，社會的分化現象也隨之產生。在階層的表現上，農民與地主、工人與雇主、人民與警察、普羅大眾與資產家、文協的與非文協的（御用的）等，呈現著對立與抗爭的現象。

1922 年的台北師範事件為開端，學潮興起，促成了台北青年會、草屯炎峰青年會等青年團體的組成，相較於近年來的野百合學運（1990）、野草莓運動（2008）、太陽花學運（2014），前者在於階層對立，後者則偏重於國政改革。1925 年彰化婦女共勵會、1926 年的台灣諸羅婦女協進會，開啟婦女運動的先聲，而葉陶、蔡阿信、謝雪紅更是農民運動、政治運動、階級運動的急先鋒，與今日婦女平權意識的普及實具典範的作用。1925 年李應章二林蔗農組合，開農民運動的先河，引發二林事件，後來在簡吉的串聯下，形成台灣農民組合。1925 年蔣渭水推動台北洋服工組織工友會，後來更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

改革思想被付諸於行動，從反對種族差別待遇到對壓榨血汗的抗爭，文化協會無疑是走在時代的先端。

(2)文藝復興：台灣新文學

1922 年，與陳端明發表〈日用文鼓吹論〉的同時，謝春木也在《台灣青年》發表



日文小說〈她往何處去〉，啟動了新文學的創作。而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與黃朝琴〈漢文改革論〉的兩篇語體改革文章則宣告台灣新文學革命運動的開始。張我軍以〈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正式向舊文學展開攻擊，為台灣文學史上的第一次新舊文學論戰拉開序幕。

新文學作品相繼出現：施文杞〈台娘悲史〉、賴和〈鬥鬧熱〉、楊雲萍〈光臨〉、張我軍〈買彩票〉等小說，張我軍《亂都之戀》更是台灣第一本現代詩集，台灣新文學運動也由理論進入具體化的階段。文學雜誌也緊隨出刊：《少年台灣》、《大眾時報》、《洪水報》、《伍人報》、《台灣戰線》、《三六九小報》、《現代生活》、《赤道報》，文學展現出豐碩的成果。

文化協會的解散並未使文化運動煙消瓦解，台灣歌謠在一九三〇年代開創了另一片天空，台灣新文學則步入葉石濤所說的成熟期。

(3)勇於創新：美台團、新劇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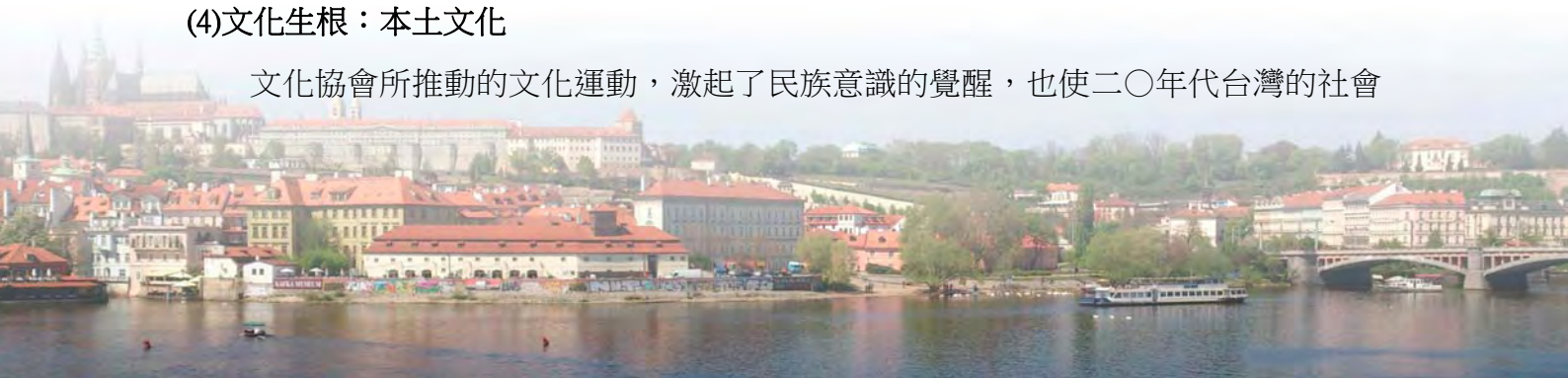
蔡培火很早就注意到以電影來宣傳以啟蒙大眾的效果，1923年文化協會決議將「映畫」（即電影）列入宣傳工作。1926年組織「美台團」。親自寫美台團團歌，以放映電影的方式展開島內的巡迴宣傳。電影在當時是新興事物，自然得到相當熱烈的歡迎，每回開映，觀看電影的人潮常常把寬廣的戲台站得無立錐之地，啟蒙教育的影響力大增。

相類似的，文化協會也積極於推動台灣戲劇的改良，藉此來開拓文化運動的新領域，其所推動者即：文化劇。新劇運動的興起，除了欲改革舊戲：即京戲、四平、亂彈、九甲、傀儡劇（皆用北京話）、布袋戲（台灣話）之外，應是受到中國如火如荼的文明戲運動及日本明治開化時期政治劇之新演劇的影響。劇團逐一成立：彰化鼎新社（1925年）、草屯炎峰青年會演劇團（1925年）、新竹新光社（1925年）、星光演劇研究會（1925年）、台南文化劇團、安平劇團。

以新興戲劇來普羅大眾的視野，文化協會表現出的是與潮流同步、勇於創新，即使是今天都不是容易的事。

(4)文化生根：本土文化

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運動，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也使二〇年代台灣的社會



空間起了發酵作用，1922年，蔡培火在《台灣民報》發表〈台灣新文學運動和羅馬字〉，提出了後世對台灣文學使用漢字或羅馬字的爭論問題。

文學作品的語言使用是日文？語體漢文？台語文？於是繼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後，跳躍至一九三〇年代的時空，台灣新文學再陷入另一階段的論戰，即台灣話文論戰（又稱鄉土文學論爭），緣起於黃石輝在1930年於《伍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鄉土文學的內涵是台灣的書寫，並使用台灣話文的語體，引發各家在《台灣文學》等刊物的討論，論爭的焦點顯然集中於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話文的取捨上，而不是鄉土文學！戰後，1970年代始又重現在新一波的鄉土文學論戰中。

在文化認同的模糊領域中，從一己的文化認同下出發，各取所需便成為路線分歧的源頭。建立屬於台灣本土的文化認同，就是建設「台灣特種的文化」，遠在一九二〇年蔡培火就提出了「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主張⁶，這一主張的原型應是在於對統治者（內地人）與被統治者（本島人）間做一族群區隔，⁷產生社會分化的效應，有利於社會運動的開展，是「台灣人意識」凝聚的開始，也是以「台灣人認同」來反擊同化（成日本人）的社會趨勢，相對的，「台灣人意識」的滋長也是告別「漢民族」、「中國人」的開始。

⁶ 蔡培火〈我島與我等〉，《台灣青年》，期四，大正九年十月，頁4。

⁷ 李筱峰認為「『台灣意識』是相對於『日本意識』而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另一面意義是在表示『台灣不是日本人的台灣』。因此，當時的台灣意識，不但未排斥『中國意識』，反而有以『中國意識』為內涵。」《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6，頁283。